

評川本芳昭，《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
東京：汲古書院，2016，512 頁

蔡長廷*

川本芳昭的新著《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是繼1998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第二本考察中國中古民族問題的專論。如其〈序言〉所述，在第二本專著裡，作者欲解明中古時期，非漢民族陸續進入中國所引起的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變遷，以及與此同時日本列島受到相同影響而改變的過程。如果說第一本專著是廣泛比較中古時期的東亞世界，是屬於不同民族、政權間差異的橫向比較；那麼，新出版的第三本專著除了延續第一本專著的思路外，更將漢、遼、金、元等政權加入，與北魏進行縱向比較，以期能對中國的中古時期能有更全面的理解。此書在學界已引起熱烈討論，著重的面向各有不同，筆者認為仍有值得進一步考慮之處，故提出以供指正。

參考後記中附的各章原題與發表年代，可以發現作者的論點與寫作方式都是延續前著《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加以擴大的。¹在本書的後記裏除了可以看到北朝國家論問題是其主軸

*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¹ 如同窪添慶文與石見清裕在《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的書評中提

外(1999、2000、2007、2011)，蠻、漢問題是另一討論重點，如作者同一年就發表三篇探討魏晉南北朝時期四川的民族問題(1999)就是其例。而古代日本、朝鮮的國、族形成與中華意識的形成兩個主題由於相互關連，則可再歸納為一大主題(2002、2003、2004、2006、2012)。結合上述主題的考察後，作者橫向考察漢、唐間的民族問題，再縱向將漢、遼、金、元納入比較，以為總結(2010、2011、2013、2014)。

第一篇的主題為「漢唐間北中國的動向——以民族問題為中心——」，由五章構成，主要探討烏桓、鮮卑及其後裔建立的北魏在面對漢文化的融合過程。烏桓、鮮卑自北亞興起後，逐漸南移而受到漢人與其他民族影響，最後各民族相互混雜融合，成為此時期歷史的背景(見第四章)。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王朝以孝文帝改革為界線，前半的王朝裏的「內朝」運作帶有濃厚的北亞色彩，但也同樣吸收許多中國制度，這不但是自漢末以來諸民族、政權互動交流的結果，也為其後的「中華世界」奠定基礎。以北魏前期為基準，跨地域與日本古代的氏族制社會進行比較，可發現相似之處；跨時間與遼、金、元相比較，重新檢討魏復古(K. A. Wittfogel)的「滲透王朝」(Infiltration Dynasties)的概念，更加精確地描述北魏的特質(見第一章)。藉由對「文成帝南巡碑」的考

及，此書是由歷年來發表的 23 篇論文，依據主題進行分類而形成的專著。

《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的問題意識有三：一、五胡諸民族的移動對於中國的哪一地域發生過哪些影響。二、長江以南的非漢民族如何被漢族所吸收，對於此時期漢民族的形成有何影響。三、承續上兩點，中國諸民族變遷的過程，對於中國周邊諸民族、國家的形成有何影響。參見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 18-19；石見清裕，〈川本芳昭著『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洋史研究》，58：4(京都，2000)，頁 778。新著《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同樣可說是延續此思路，集結 1999-2014 年以來的 17 篇論文，以主題分類。

察，理解北魏前期「內朝」構造的層次性(頁 51)，而由鮮卑式職官凌駕於中國式職官之上(見第二章)。再進一步將北魏的「內朝」與漢郎官制度、遼著帳官制度、元怯薛制度、日本人制進行比較，指出北魏、元、日本三者的官制結構更為相近，是由氏族制進一步發展形成，與漢有根本差異，可見北魏前期是以具有軍事力量的「內朝」為核心，統治中國官僚機構，具有征服王朝的型態(頁 128-129)。這也可以重新修正征服王朝論、初期國家等觀念(見第五章)。除卻政治制度上的相互融合外，拓跋鮮卑在文化上也有所改變，從道武帝在天興四(401)年以漢字表音創出的四萬餘鮮卑字，到太武帝在始光二(425)年太武帝又新造類似萬葉假名的四千餘字，可知其在利用中國文化，擬聚本身的民族意識(見第三章)。

第二篇的主題是「漢唐間東亞的動向與古代日本的國家形成」，作者在第一篇所述多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從文化交流的觀點考察古代日本國家及其相關制度如何形成。首先是中國將統治者的稱呼(王、大王、天皇)、年號的使用、天下秩序觀等概念傳播到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地，各地在形成國家時將同一概念發展出不同的內涵並相互影響，最後產生新的世界秩序與「中華」意識(見第一章)。從《隋書·倭國傳》與《日本書紀·推古紀》可看到其中的倭國內部也開始意識到本身的國家意識及其在東亞歷史世界的定位，進而完善其政治機構，而週邊國家的發展也影響到中國歷史至東亞世界局勢的發展(見第二章至第四章)。

第三篇的主題是「漢唐間西南中國的動向」，作者將焦點轉到西南中國的民族問題，探討此時期民族間與民族與中國王朝的互動。魏晉至隋唐時期四川地域(梁州、益州)的民族分布包括：在魏晉時期雖已設郡縣，但仍有許多地區不在統治範圍裏，其中更有西南部、東部的夷，北部的羌，以及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大量獠進入，所以是無法用蠻

來概括此地域的多元民族。五胡十六國到西魏時期，可以發現劉宋以來，自南越而來的獠大量的占據四川地域全境，隨著王朝統治的逐漸深入，到北魏、西魏時期，在前朝的基礎上設置更多郡縣，更有效的統治獠。北周時期，獠已被納入編戶齊民，但因漢獠混居，也產生抗爭。隋唐時期儘管更能有效統治獠，但獠的反抗也越見強烈(見第二章至第四章)。西南中國的民族儘管面對隋唐的強大壓力，仍建立南詔，對照前述日本在漢唐間的變化，西南中國也有建立古代國家的類似變化(見第一章)。

第四篇主題為「漢唐間民族的諸問題與東亞」，作者進一步探討前三篇的重要議題，並提出新的視角與方法論。作者考察第一篇的胡漢民族問題時，先探討朴漢濟歷來提出的學說，從適用於五胡北朝的「胡漢體制說」到用於東晉南朝的「僑舊體制說」，最後將兩者統合為「僑民體制說」；周偉洲則對於「胡漢體制說」提出「漢族為主流說」的論證，認為漢族在民族互動中是多數。相對於兩位學者的論述，作者提出此時期的漢族是動態的「正在形成的漢族」，如此才不會陷入胡漢問題裏無法明確分別胡與漢、以及將漢族視為先驗性存在的誤區。同時也要注意南方或東方的類似情況，才能更全面性的掌握大勢(見第一章)。接著，作者比較北魏、遼、金三朝正統意識的發展變遷，認為三者發展過程上，都經歷過從祥瑞來認定五德、到以繼承天下一統王朝的五德。金朝是在一開始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產生中華意識與正統思想，遼朝則是在後期才產生，但在征服王朝論與胡族國家論的論述裏卻都未提到(見第二章)。在延伸探討古代的新羅、日本的國家意識時，作者分別探討新羅人崔致遠(857-940)與日本人阿倍仲麻呂(698-770)的任官經歷，認為兩位均有強烈意識到本身夷狄的身分，在認定自身君主分別為新羅王與日本天皇的前提下在唐朝任官。但兩國的天下觀則有差異，韓國認為天下包含朝鮮、中國，日本則認

為天下是以日本為中心(見第三章)。

最後則是本書的重點，作者以北魏內朝為基準，比較遼的著帳官、元的怯薛、漢的郎官。北魏、遼、元的制度均是在氏族制崩壞、中央權力逐漸集中的前提下，產生了如北魏內朝、遼的著帳官、元的怯薛等皇帝(可汗)直屬的側近官集團，三者有極高的類似性。漢的郎官雖也同樣是在氏族制崩壞的前提下產生，但是以家父長權力為基礎而產生，兩者並無關係。

〈結語——對於所謂「少數民族」的理解——〉，作者提出更進一步的問題，認為漢族是自古到今通過多地域、多文化、多民族的接觸與融合所形成的民族，所以思考現今中國的民族問題時，不能僅用民族抗爭的角度思考。直至近代，雖然中國共產黨提出民族自治，但仍以大漢族主義為主要政策，這從西藏的案例即可見到(頁 502)，是需要進一步反思的。

總結來說，作者從民族互動的角度，系統考察北中國、西南中國、東方的日本等週邊民族與國家與中國政權的交流，希望能了解此時期東亞世界民族互動，最後解釋漢族的實態。

本書要點首先是貫通本書的「東亞歷史世界」概念，自西嶋定生提出東亞歷史世界的概念後，²學界大多使用此框架進行討論，此框

² 西嶋定生對於東亞歷史世界的定義：東亞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加上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及蒙古高原與西藏高原中間的西北迴廊地帶東部的諸地域，從上述歷史世界也可推知，領域是流動的，不能認為是固定的。但即使同樣是中國的周邊地域，北方的蒙古高原、西方的西藏高原，以及越過西北迴廊地帶的中亞諸地域或是越過越南的東南亞諸地域通常是不在其範圍的。參見西嶋定生，〈總說〉，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世界歷史 4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I》(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3-20；後收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第二篇第一部第一章，〈序説——東アジア世界の形

架是以律令制、漢字、儒教、佛教為共同文化特徵來定義地域範圍。回顧日本的東洋史研究，另一個重點則是以田村實造提出的「北亞歷史世界」，這與「東亞歷史世界」可說是東洋史的兩個基軸。在學界的使用上，有時遊牧民的「北亞歷史世界」會與農耕民的「東亞歷史世界」相互交錯。³隨著全球史研究取徑的興起，「東部ユーラシア(東部歐亞)」(頁 79)一詞在探討漢唐間的相關議題時也逐漸開始使用，⁴菅沼愛語認為「東亞歷史世界」雖包含中華、朝鮮半島、日本

成》，頁 398。

³ 堀敏一，《東アジア世界の歴史》(東京：講談社，2008)，頁 19-31。更影響到魯惟一(Mark Edward Lewis)在劍橋大學出版的中華帝制史系列中的隋唐史之論述，如討論唐與外在世界的互動交流時，也是以官僚制度、漢字、佛教等面向論述，與西嶋定生的論述幾近一致。參見 Mark Edward Lewis, *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3-156.

⁴ 以東部歐亞為地域分析框架的專書如下：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荒川慎太郎、澤本光弘、高井康典行、渡辺健哉編，《契丹〔遼〕と10～12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東京：勉誠出版，2013)；鈴木靖民、金子修一編，《梁職貢國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東京：勉誠出版，2014)；菅沼愛語，《7世紀後半から8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の国際情勢とその推移唐・吐蕃・突厥の外交関係を中心に》(広島：溪水社，2014)。荒川正晴在書中序言提到：「歐亞東部地域或歐亞東部是指涉從帕米爾以東的中亞到東方的中國、蒙古利亞等的概略用語。……在討論中亞的交通與交易時，將游牧國家與綠洲國家，以及周邊諸國家與前兩者的政治統屬關係與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共生關係與秩序是無法切離考察的。所以本書從「歐亞東部」的廣域空間來考察。」參見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頁 1、7。菅沼愛語進一步定義此概念，認為：以中華文明圈為核心，包含在歷史上與其密切關聯的，並有持續戰爭、外交等直接交涉的周邊諸國家為主的地域，稱之為「東部歐亞」。具體來說，中華(唐)、西藏(吐蕃)、北亞(突厥、回鶻)、中亞東部(東突厥斯坦=現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域)、東北亞(渤海、契丹)、朝鮮半島(高句麗、新羅、百濟)、日

等地域，但不包含西藏、北亞、東突厥斯坦等地域。與隋唐時期的中華文明圈持續直接交涉，並包含東亞、北亞、西藏、中亞等地域，「東部歐亞」是最洽當的。這樣的廣闊地域也是包含幾個相異文化圈的複合文化圈，可說是更強調交流互動的框架。⁵作者在書名使用東亞一詞，但因廣泛討論中國及其週邊民族或國家的交流互動，所以可說是也同時使用「東部歐亞」的概念。

然而，作者論述範圍雖已涵蓋「東部歐亞」的大部分，但西域的諸民族或國家則較無論述，甚為可惜。從出土墓誌顯示，粟特人在北魏時已有任官的記載，其後在北周、西魏等都曾任官，在柔然、突厥等游牧國家裏也占有一定地位，⁶如將漢唐間的粟特人放入東亞史或東部歐亞史的框架中考察，應能讓考察更具整體性。另一方面，森安孝夫從北亞史或中央歐亞史的角度，將騎馬遊牧民建立的政權歸納為「中央歐亞型國家」，可說是更廣義的征服王朝論，將五胡、北朝諸政權均納入，⁷但作者僅重新檢討魏復古的征服王朝論，未能與森安孝夫提出的見解進行對話，較為可惜。

再者，作者從綜合胡族與漢族的視角考察漢唐間的歷史，本書中提到五胡諸國、南方的蠻、獠、高句麗、倭國等，在當時都以取得中

本、南詔(雲南)、越南等範圍。管沼愛語，《7世紀後半から8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の国際情勢とその推移唐・吐蕃・突厥の外交関係を中心に》，頁4。

⁵ 管沼愛語，《7世紀後半から8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の国際情勢とその推移唐・吐蕃・突厥の外交関係を中心に》，頁4。

⁶ 山下將司，〈北朝末～唐初におけるソグド人軍府と軍団〉，收入森部豊編，《ソグド人と東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渉》(東京：勉誠出版，2014)，頁161-173。

⁷ 森安孝夫，〈基調講演内陸アジア史研究の新潮流と世界史教育現場への提言〉，《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6(東京，2011)，頁3-34。

原王朝授與官爵，來獲得處理本身地域政治事務的合法性。非漢民族取得中原王朝授與官爵一般都被視為是納入「東亞歷史世界」的冊封體制之證據，但作者從更廣泛的交流互動考察，讓讀者能從更宏觀論述東亞歷史世界裏人、物、制度、思想的傳播。如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討論征服王朝的創建者時，認為耶律阿保機、完顏阿骨打在創建征服王朝前，已經進入中原王朝官僚體制裏擔任節度使，所以他們是在中原王朝體系上崛起，而非體系外。⁸此點無疑也是五胡北朝與遼金元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類似之處，這也再次呼應作者呼籲的從綜合的視角考察的必要性。

第二個要點是北魏前期——遼——元的征服王朝官制結構的探討。有關遼、金、元的官制結構在日本學界是屬於北亞史或內陸亞洲史研究的一環，白鳥庫吉、箭內互、田村實造、島田正郎、加藤修弘等學者形成一套研究脈絡。五胡北朝的研究則是田村實造接著考察五胡十六國政權的性格，將慕容燕、拓跋魏等歸類為征服王朝。⁹其後谷川道雄研究五胡政權的國家構造與特質，提出「宗室的軍事封建制」，論述北亞諸民族在進入東亞建立政權的侷限性。¹⁰上述兩位學者已經意識到北魏與遼金元等征服王朝的同質性，但未進一步比較。作者在接觸遼、元的相關材料後，認為北魏內朝制度與遼的著帳官、元的怯薛在本質是類似

⁸ 參見 Herbert Franke, *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üan Dynasty* (München: 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ünchen: In Kommission bei C.H. Beck, 1978), 8-9. Herbert Franke, introduction to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s.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14.

⁹ 田村實造，《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創文社，1982），頁 122。

¹⁰ 谷川道雄，《增補隋唐帝国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98），頁 12。

的制度，都是皇帝(可汗)的側近官集團。遊牧民的氏族制在可汗權力不斷壯大下，將各氏族優秀的子弟納入身邊成為側近官集團，是內朝制度的起因。作者承續魏復古提出的「征服王朝論」，重新檢討北魏前期的國家性質，完善了對於北魏、遼、元的認識，但作者也提醒不能忽略中華意識對於這些王朝的影響，才能全面理解前近代中華帝國的構造。

在探討北魏的內朝結構時，筆者同意作者論述應如同田村實造提出的「北亞歷史世界」的內涵之一，抑或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提出的「內亞的草原帝國傳統」。¹¹更進一步深究，如中散官、三都坐大官等北魏前期的特殊官職，該如何與南巡碑記載的官職進行整體的論述。中散官部份已有鄭欽仁的奠基性研究，中散官是如同「侍中」之直宿禁中，筆者認為中散官同樣屬於「內朝」系統，那麼如作者所提「內朝」是有層次性的結構，那麼中散官定位為何，也尚未討論，這應是值得進行的後續課題。

第三個要點是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思考，作者從近四十年研究漢唐間民族互動的歷史裏得知，現今的漢族是在多民族、多文化、多地域中不斷相互交流、互動所形成的，如果忽略此點，不只在理解民族史時產生偏差，連帶對於現今中國少數民族的理解也同樣會有偏差。

川本芳昭的兩本專著，揭示了漢唐間東亞歷史世界諸民族的互動

¹¹ Peter B. Golden 論述突厥史時提到內亞國家間有草原帝國傳統(steppe imperial traditions)，每個新國家或政權不只承接前任國家或政權的傳統，更修正傳統以適應當時的環境。參見 Peter B. Golden, "The Türk Imperial Tradition in the Pre-Chinggisid Era," in *Turks and Khazars: Origins, Institu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Pre-Mongol Eurasia*, ed. Peter B. Golden (Aldershot, UK: Ashgate, 2010), 25-26.

與發展，讓我們理解民族問題的複雜性與多重面向。由於記載非漢民族史料之缺乏，使得在進行研究時困難重重，但作者仍然以目前儘可能蒐集到的史料為基礎，廣泛的使用比較方法，不只對於漢唐間歷史有共時性的宏觀理解，也能貫時性的對於性質相同的征服王朝的構造有所理解。

(本文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收稿；2017 年 10 月 23 日通過刊登)